



清康熙年间刊行的樊庶编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所载晚年苏轼写真画像。 乔红霞 提供

途程颠簸酬唱多

苏轼离琼北归之路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郑行顺

北宋元符三年(1100年)六月二十日深夜,苏轼怀着怅惘的心情,在小儿子苏过的陪护下,从澄迈县城(今老城)西侧的通潮驿渡海北返,离开海南。这一年春天宋徽宗登基,诏令谪居“海外”多年的老臣苏轼迁居廉州(治所在广西合浦)。彼时,苏过的妻儿,与大哥苏迈、二哥苏迨的眷属,一大家子仍住在惠州。

迁廉州,再改永州

北渡顺风顺流,次日一早在徐闻逆角场登岸,于是陆行到雷州治所海康县,住下来与好友秦观欢会。秦观因与苏轼友好遭贬雷州,也已获诏移英州(今广东英德市),尚未起行,正在等待苏轼的到来。死后余生得相聚,该是何等快慰,万般感慨都付诸唱和。苏轼还兴致勃勃,应雷州太守所请,为伏波庙作记。

六月二十五日,苏轼与秦观互道珍重,依依不舍作别,离海康赴廉州。沿官道前行才四五十里,未出海康境,便遭逢连日暴雨,周遭涨水,道路泥泞,只好暂住兴廉村净行院。“荒凉海南北,佛舍如鸡栖。”“林下对床听夜雨,静无灯火照凄凉。”幸有村学老先生慕名悉心款待,才不至于太狼狈。住了几天不见放晴,不得已听从当地人所劝,放弃陆行,涉险改走海路。蜑舟漂泊在北部湾大海中,夜来天水相接,疏星闪烁。苏轼起坐四顾,

不禁暗自叹息:“吾何数乘此险也!已济徐闻,复厄于此乎?”

幸好海上风平浪静,有惊无险,终于在合浦县东北的白石登岸,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。

宋皇朝虽然一再把政见不同的朝臣贬逐到边荒,却亦未曾过多限制他们的社交活动,更何况苏轼名满天下,“粉丝”无数。廉州太守张仲修(字左藏)对他礼遇有加,灵川人欧阳闾与之诗书往来,宴聚多了起来。

才住了个把月,又接到“徙内郡”的诏令,改授苏轼为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(今湖南永州市)居住。这回可以将寄居在惠州的家眷都迁去了。

八月二十九日,苏轼离廉州,水陆兼程,途经白州(今广西博白县)、鬱林州(今广西玉林市)、容州(今广西容县)、藤州(今广西藤县),迤逦到梧州。所到州县都有州守县令接风,但苏轼未多逗留,急着和久违的亲眷相聚。于是父子从梧州乘船沿西江顺流东下,直奔广州。

经广州,病卧韶州

九月底,苏轼到达广州,长子苏迈、次子苏迨也已依父命率领寄居在惠州的家眷一众迁来会合,悲欢之情自不胜言。

广州是岭南都会,故旧友朋多起来了,道士、和尚不断来约邀,大小官员设席宴集,年轻的“粉丝”们抓住机会接踵登门求教。喜欢热闹的苏轼一扫“海外”的孤寂,应酬不绝。友人孙叔静、李端叔成了“天涯老兄弟”,唱和自是少不了的。在惠州时就曾往来的东莞资福寺长老又来拜访,求为禅寺罗汉阁作记,为再生柏作赞语。广州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则请为作众妙堂诗。此后,一路上不断有道士、和尚缠绕着他,邀游名山寺观,雅求赠诗留题。初时苏轼尚且兴致勃勃,不辞步履。至于吟诗作文,苏长公出口成章,有何难哉?孰不知先生已届暮年,不堪积劳。要命的是,不辞为人师的苏公仍旧“诲人不倦”:广州推官谢举廉带上苏轼旧作上门谒见,苏轼“留语终日”,还录诗相赠。南海秀才黄洞持自作诗《鉴空阁》上门请教,苏轼也不吝作诗相和。

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,十一月初,苏轼与家人分乘舟船沿北江湖流而上。朋友们追舟饯行,直至清远峡,同游广陵寺,才尽兴握手惜别。

十一月下旬,舟行至英州(今广东英德),苏轼好运再至,接到朝廷诏令,恢复他的“朝奉郎”职级,给予“提举成都玉局观”虚职,还可以“任便而居”。也就是说,苏大人再不是遭贬逐的罪臣,好歹又有了挂名的官称和薪俸,而且不必上班管事,想住哪里住哪里。宋代有定制,大臣罢职,令管理道教宫观,以示优礼。虽无职事,却可借名食俸。苏轼喜不自胜,欢呼“世间美事,岂复有过此者乎”。当然不去湖南永州了,决定到江苏常州定居,常州治下的宜兴县有他的田庄,家人衣食日用可保无忧。

一扫心中郁积的阴霾,他又活

跃起来,有时还会斗趣取乐。英州太守何及之主持修建的石桥正好落成,难得苏公在此,便求他纪事。苏轼作成四言诗《何公桥》,却不肯送出。何太守来拜谒索求,苏轼说:“未尝至新桥所在,难以落笔啊。”何太守改日命人“具食”,亲自来接,与之“并轿而行”。到了石桥所在,苏轼看了看,说是“正堪作诗”;酒宴未了,让人晚间来取。

由水路继续北行,下一站是韶州(今广东韶关)。英州到韶州,越来越接近北江上游,滩险浪激,船上“士无人色”,但苏轼仍稳坐舟中,“作字不少衰”,情绪很饱满。

十二月七日到韶州,舟行到此为止。苏轼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,与地方官员、和尚道士周旋。韶州太守狄咸延频频宴请,彼此赠诗唱和。新年元旦日,狄太守又邀苏轼饮于州城西北九成台,苏轼即席挥笔书写《九成台铭》,落款自称“玉局散吏”。韶州治所在曲江,县令陈密也“款待甚殷”,苏轼为作《陈公密子石砚铭》。韶州治下河源县令冯祖仁与苏轼早有结交,邀苏轼及家人同游南山,取其先父所作诗七篇请苏轼为题跋,苏轼好话多说,称“灿然有唐人风”;又有鹤、鹿、马三画轴,苏轼告以“迫行不暇题”。没完没了的冯祖仁又赠送自己的诗作,苏轼只好以“藏之巾笥,以为光宠”回复。和尚们也不肯放过他,还在英州时南华寺住持明禅师就来信邀游。南华寺在曲江县南,是禅宗六祖惠能的道场。待苏轼到了韶州,明长老就紧盯着他。苏轼亦不吝笔墨,一游之后为作《谈妙斋铭》《南华寺功德疏》《南华长老题名记》,明长老该心满意足了吧?

旅途劳顿和繁忙应酬,年老的苏轼招架不住,在韶州病倒了。他在与冯祖仁的书信中说:“到韶累日,疲於人事,又苦河鱼之疾。”“河鱼之疾”指腹泻,鱼烂先自腹也,大意不得。关于苏轼的病,这里要多说几句。苏轼患痔,早有自白。绍圣四年(1097年)六月渡海过琼的前夜,与弟苏辙在雷州,“余时病痔呻吟,子由亦终夕不寐”。但是过琼之后,倒是未见提及,是不是少啖肉腻,多吃菜蔬,少有酒宴,多享清闲的缘故?只是在与亲友的书信中,不止一次提到自己苍老、消瘦了。曾在给侄孙元老的信中说:“近来鬚鬢雪白加瘦,但健及啖啜如故耳。”这不是好兆头,是不是痔疮掩盖着别的肠疾呢?

滞虔州,长逝常州

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元旦过后,苏轼离开韶州,陆行过大庾岭。四日,到大庾岭南麓龙光寺,寺僧请东坡吃斋饭,赠送两大竿长竹扎担架,换来苏轼留诗。五日,到岭北大庾县,为应酬各界,又停留数日。当地的“粉丝”们太兴奋了,“赢粮(带干粮)而从轼者三百里”,一直把他护送到下一站虔州(今江西赣州)。

正月十二三到虔州,拟由赣江舟行顺流北上,再渡长江。但正值赣江的枯水期,“待春水生方能成行”,不得不“淹留”虔州两个多月。

在此期间“长少卧病,幸而皆愈”。历经半载跋涉,苏轼的身体显得越来越虚弱。但是到哪里都有追随者,他又从来从不擅于对人说“不”。虔州太守霍汉英、本地隐士阳孝本与之唱和不绝。景德寺僧显荣之数日相陪,直到苏轼为其湛然堂作诗、作《灵感观音偈》方才罢休。崇庆院南禅长老惟混也不肯消停,缠着苏轼游寺院,苏轼为作《清隐堂铭》《混长老真赞》。慈云寺长老明鉴则请他到寺中泡澡,苏轼有《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》诗。

三月下旬,春水渐至,勉强可以舟行,于是离虔州,月底至吉州(今江西吉安),四月四日至洪州(今南昌市),过庐山,到九江,四月十六日达湖口。苏轼多次上庐山,诗歌中纵情吟咏多矣,如今老病缠身,总感到“陵谷草木皆失故态”。但山中道友契好如昔,“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”,一路护送,给了苏公许多温暖。

出湖口沿长江东行,五月一日至金陵(今南京市),又有禅院住持、寺庙长老邀游讨诗文,更不赘述。

自离英州后,苏辙便一再来信,劝兄长到河南许昌定居。苏轼贬儋州的同时,苏辙贬雷州,但是运气好一点,一年后便获赦北返,后来也“任便居住”,落脚许昌。苏轼“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”,但反复再三委决不下。身体每况愈下,又怕拉家带口相累。直至自金陵渡江前,他才决计不去许昌,要住常州。

约五月中下旬,至真州(今江苏仪征),苏轼“病暑暴下”,“疲病加乏”,已经到了“虚乏不能食,口殆不能言”,困卧不起的地步。可是仍然有邀请宴游者,苏轼只好“乞且罢”。

大约是六月上旬,自真州避疾渡江,过润州(今江苏镇江)。在润州,作《荐苏子容功德疏》,勉强上宅祭奠去世不久的好友苏颂;又作《祭柳仲远》文,祭奠堂妹和妹夫柳仲远夫妇墓,文中有“天不我亡,亡其朋戚”“我穷且老,似舅何益”句,凄憾之甚。

六月下旬,终于到常州,住租借的孙氏宅。苏轼自知不久人世,依照惯例向朝廷上呈表奏,以疾告老,乞求致仕。其中说道:“今已至常州,百病横生,四肢肿满,渴消唾血,全不能食者,二十馀日矣,自料必死。”

七月二十六日,又作《答径山琳长老》诗:“与君皆丙子,各已三万日。一日一千偈,电往那容诘。大患缘有身,无身则无疾。平生笑罗什,神咒真浪出。”是为绝笔。

七月二十八日,苏轼溘然长逝。苏公逝矣,苏辙在为兄长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道:“讷闻四方,无贤愚皆咨嗟出涕。”敬仰苏先生的海南官民,不知道又作何感慨。离琼才一年有馀,颠沛于山高水长的路途上,忙碌于围追堵截的众“粉丝”中,竟就此长逝!要是当初留下不走呢?在读书、授徒、写作的闲适中,到息轩坐坐,上黎家兄弟菜园子看看,或者就宅在桃榔庵里卧听小儿子苏过诵读诗书。兴致来了找符老秀才喝杯小酒聊天,要不就到黎人集市看热闹。芒鞋竹笠,薯芋蔬食,又何曾不是养生的好去处? 固